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库

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

CHUGUO DUCHENG YU HEXINQU TANSUO

尹弘兵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K231.07
8

K231.07
8

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

CHUGUO DUCHENG YU HEXINQU TANSUO

尹弘兵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尹弘兵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12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库)
ISBN 978-7-216-06194-0

- I. 楚…
- II. 尹…
-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楚国(? ~前 223)
- IV. K23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8883 号

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

尹弘兵 著

出版发行: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安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330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9
插页:4

版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7-216-06194-0

印次: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在楚国八百年的历史中，曾先后建都于丹阳、郢、郢、陈城和寿春等地，除了战国晚期最后半个世纪楚人因危亡所迁的陈城和寿春两地相对明确以外，其他几处都邑，尤其是丹阳和春秋郢都所在，一直颇有争议，至今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成为楚国历史地理与文化领域的重要疑难之一，极大地制约了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研究解决。

关于楚丹阳的位置，早期文献中先后有当涂、枝江、秭归和丹淅四种不同的说法，其后又派生出先秭归后枝江、先丹淅后荆山（或南漳）、先丹淅后秭归再枝江和先商县后丹淅四种补充或调和说法，可概之为“四系八说”，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界曾围绕诸说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较大地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入进展，尤其是对当涂说，在前人质疑的基础上，提出了较多的否定意见，然于其他诸说之间，学者们分歧仍然很大，而田野考古方面的资料还不足以支撑对某一说法的肯定或否定，加之对有关材料的认识和理解视角与标准不一，以至难以达成基本的共识。

为配合三峡工程的修建，近二十年来考古界在峡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发掘，获得了一大批层位清楚、序列比较完整的实物资料，对这一地区的古代文化内涵和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分析表明，在三峡境内今秭归一带，商代至西周早中期的文化遗存多以釜、罐、钵、鼎之类陶器为特征，属于与重庆和川东地区联系紧密的土著文化系统；从西周晚期开始，楚文化因素才逐渐进入峡江地区，春秋早期以后，秭归一带才被真正纳入楚人的疆土和势力范围；而早先被秭归说所认定为“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的鲢鱼山、曲沱“楚王城”等几处遗址，亦先后为考古资料所否定，从而宣告了楚丹阳秭归说的最后终结。

通过第二、三两次文物普查，以及近些年学术界为探索楚都问题所进行的

一系列田野调查和实地踏勘，今荆山附近乃至南漳境内的楚文化遗存皆不早于春秋时期，到目前为止，这一地区还没有发现任何西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或遗物，从而引起学者们对楚丹阳先丹淅后荆山（或南漳）说的反思。

由于秭归、南漳说所面临的困境，而与之相关的先秭归后枝江、先丹淅后秭归再枝江诸说亦相继淡出学界视野，当前关于楚丹阳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枝江、丹淅或先商县后丹淅二系三说之间。探寻范围的极大收缩，可以说是近年来楚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

楚郢都所在，汉晋学者多认为在当时的江陵一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江陵纪南城遗址的发现及周围大量楚墓的发掘，此说为多数学者所认同，成为学界主流。此外，唐代后期学者杜佑曾提出楚文王时由秭归迁枝江，亦曰丹阳，然后再迁江陵的观点，所言楚文王迁都，按照《史记》等通常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从丹阳迁于郢。由于此说在秭归与江陵之间确立了一个中间环节或过渡点，同时又可照应楚丹阳枝江说的传统看法，故为部分学者所遵从。另有一些学者根据《左传》所载的有关史实以及楚丹阳位于丹淅地区的形势，认为楚郢都应在汉水中游以西地带，或即今宜城县境内的楚皇城遗址。还有部分学者从楚丹阳应在丹淅或南漳一带的前提出发，同时又考虑到江陵纪南城故址及其周围大量楚墓存在的史实，提出早期郢都在宜城，后来迁江陵；或先在宜城楚皇城，后迁当阳季家湖古城（早年属枝江所辖），再迁江陵纪南城的看法，将早先诸说融为一体。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发掘和研究，学术界逐步认识到，就纪南城遗址的规模、布局及周围数以万计楚墓分布的事实来看，确为楚郢都所在，但这里的楚文化遗存大多为战国时期，尤以战国中晚期为突出，属于春秋阶段的遗存不仅比重小，而且等级都较低，未见有高级贵族在此活动的遗迹，说明纪南城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的楚都，春秋郢都还需另往它处探寻。由此可见，太史公等所言“江陵故郢都”当就战国时期的形势而言，并不能完整反映从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四百余年楚郢都的变化过程。春秋郢都何在？或当阳或宜城，还是另有其地？皆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

尹弘兵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在荆州博物馆工作了十二年，有一些田野考古和楚文化研究的经历。2002年秋回到学校读研究生，即以楚文化探索作为主攻方向，通过三年硕士阶段的学习，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后，经反复协商讨论，确定以丹阳、郢都探索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希望在前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新出的考古资料和力所能及的田野调查，对楚丹阳和郢都问题展开进一步的分析、论证，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改进，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寻找新的切入点，在一些重要疑难问题上有所推进或收获。

经过三年的努力，他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交给有关专家评审和答辩委员会，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较好评价和肯定。按照原先的方案，拟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再作全面的补充和修改，尤其是对有些具体问题，还需要深入地钻研和细致地分析。由于他所任职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厚爱，将其论文很快纳入该院资助出版计划，且交稿时间要求甚紧，因而只能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作一些简要补充和技术性的加工。

论文在楚丹阳、郢都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方面做了一些基础性的资料整理，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关于半姓与楚国、楚蛮的关系问题，对西陵峡区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分析，就楚丹阳枝江说与丹淅说的比较，早期楚人的核心区与丹阳、郢都之间的辩证关系等，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有其合理的成分，对有关问题的认识有所推进。应该指出的是，文中有些探索还很不完善，有待进一步的深化、补充，有些材料还需要认真分析、理解，有些观点和结论还需要仔细论证，否则很难令人信服。

希望弘兵多多听取意见，认真总结经验，坚持不懈地钻研下去，为促进楚文化研究的不断进步和楚都问题的圆满解决作出自己的贡献！

徐少华

2009年7月2日于珞珈山

内 容 提 要

楚都地望历来颇有争议，至今未有较令人信服的结论。而楚国都城与中心地域的不明，又给楚文化研究带来较大的困难。本书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对楚丹阳和郢都的问题作全面的论证，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希望能在一些重要疑难问题上有所推进，对楚国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的深入有所助益。

本书回顾了楚丹阳与楚郢都地望各种主要说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近年来学术界在楚都研究上的一些新动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楚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首先清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力争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其次是突破城垣的束缚，不把城作为探讨楚都的前提。第三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探讨。在“反”的方面，首先对可能性不大的当涂说和秭归说进行分析，加以排除，以缩小分歧的范围，然后对剩下的丹淅与枝江两说进行详细对比，让对立双方在一个平台上对话，不仅是要否定较不合理的一方，更重要的是找出所要肯定的一方在逻辑体系上还存在的问题，并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加以解决。在“正”的方面，主要从半姓、楚蛮、楚国三者关系入手，逐步理清其相互关系，通过对楚蛮的研究、确定不同时期楚蛮的分布区域，以楚蛮来定楚国，进而确定不同时期的楚核心区之所在，从区域的角度来探讨楚都。

通过系统分析，本书认为，商末周初时半姓一族居住在丹江上游地区，此时的楚都丹阳仅与丹山或丹水相关连。熊绎受封时，徙居荆山脚下，此时的楚都丹阳当在丹江下游的丹淅之会。西周晚期以后，楚熊渠的活动区域在“江汉”地区或“江上楚蛮之地”，西周末年楚核心区移至“江汉”中的“沮漳”之地，此后至春秋晚期，楚都与楚核心区均在“江汉沮漳”之地，今蛮河流

域。春秋晚期以后，楚都及楚核心区南徙至今沮漳河流域，战国早期时楚都当在今沮漳河中游的当阳、枝江一带，以当阳季家湖楚城为核心的东周聚落群当为战国早期楚都及楚核心区，战国中晚期时楚都移至沮漳河下游的荆州、荆门地区，以江陵纪南城为核心的东周聚落群应为战国中晚期楚都及楚核心区。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意义	1
二、研究现状	3
(一) 丹阳研究	4
(二) 郢都研究	7
三、研究计划	9
(一) 基本思路	9
(二) 研究方法	11
(三) 论文的创新、难点与解决途径	14
第一章 半姓与楚国	15
第一节 半姓的历史及其建国	15
一、半姓的起源与年代	15
二、半姓建国相关问题	20
第二节 鬻熊史事解析	26
一、鬻熊为文王师解析	27
二、火师说解析	32
第三节 半楚关系讨论	38

第二章 楚都丹阳“秭归说”辨正	42
第一节 丹阳“秭归说”辨析	42
一、丹阳“秭归说”之由来	42
二、秭归丹阳与早期楚国之分析	44
三、夔国地望所在	46
四、归乡、归乡县、夔国与秭归说之完成	48
五、郦道元之后“秭归说”的发展	59
第二节 丹阳城与夔城的考古学观察	60
第三节 丹阳“秭归说”的考古学文化观察	63
一、典型遗址	64
二、综合分期	68
三、文化属性	88
四、文化进程	89
五、西陵峡区的考古学文化演进与丹阳“秭归说”	93
第三章 丹淅说与枝江说的对比研究	98
第一节 文献方面的对比研究	98
第二节 族源方面的对比研究	100
第三节 地理方面的对比研究	102
第四节 考古方面的对比研究	107
第五节 丹淅说与枝江说对比研究之总结	112
第四章 楚蛮与楚国	118
第一节 楚蛮源流考	118
一、楚蛮的起源	119

二、甲骨文资料中的楚蛮·····	122
三、周代的楚蛮·····	128
第二节 楚蛮地域考·····	129
一、商代楚蛮之地域·····	129
二、周代楚蛮之地域·····	131
第三节 楚蛮的考古学观察·····	142
一、三苗兴亡与江汉地区考古学文化演进·····	142
二、商代楚蛮的考古学观察·····	148
三、周代楚蛮的考古学观察·····	159
第四节 楚国与楚蛮的关系及楚国地望的初步推定·····	162
第五章 楚丹阳地望的变迁及相关问题分析·····	166
第一节 商末周初的丹阳·····	166
一、商末鬻熊所居的丹阳·····	166
二、西周初年熊绎受封时的丹阳·····	170
第二节 周昭王南征考·····	175
一、昭王南征对象非楚国辨·····	176
二、昭王南征对象为楚蛮·····	182
三、安州六器铭文史事辨考·····	184
四、昭王南征的路线与区域·····	188
五、昭王南征与荆楚关系之产生·····	193
第三节 荆楚关系问题·····	196
一、西周时期荆楚关系的产生及其演变·····	198
二、东周时期荆楚关系的持续演变·····	200
第四节 西周晚期的楚国历史、文化与地域·····	202

一、楚国进入江汉地区的历程·····	202
二、襄宜平原西周至春秋早期遗存的初步分析与楚都丹阳探索·····	209
三、对早期楚文化的初步讨论·····	216
四、从春秋郢都看晚期丹阳·····	223
第六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都城与核心区 ·····	225
第一节 楚都迁郢及相关问题 ·····	225
一、楚都由丹阳迁郢之原因·····	225
二、鄂西地区的楚郢都探索·····	228
三、对春秋郢都探索的反思 ·····	232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楚文化核心区与楚都探索 ·····	237
一、鄂西地区的东周聚落群与春秋郢都探索·····	237
二、蛮河流域的东周聚落群考察·····	239
三、蛮河流域东周聚落群的中心聚落与春秋郢都探索·····	245
四、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国历史与都城探讨 ·····	247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核心区与楚都探索 ·····	251
一、纪南城的性质·····	252
二、纪南城作为楚都的年代·····	257
三、郢郢与栽郢 ·····	263
四、沮漳河中游地区的东周聚落群与楚核心区探讨·····	267
结 语 ·····	271
主要参考文献 ·····	275
后 记 ·····	291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楚国都城地望，是楚文化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疑难问题，也是楚国历史地理的核心问题。楚国从商周之际“居丹阳”，到公元前 223 年灭于秦，前后历时八百余年。在此期间，从一个“土不过同”的小邦，发展成“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大国，拥有“半天下”的地位，对南中国的统一和文化交融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楚国疆土的扩展，楚国都城及中心地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历过多次重大的变迁。据《世本·居篇》记载，半姓立国之前，其首领鬻熊就“居丹阳”^①，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为诸侯，建立半姓楚国，仍“居丹阳”^②。下至春秋早期楚武王时，楚都迁郢^③。公元前 506 年（楚昭王十年、鲁定公四年），吴师入郢，楚昭王奔随，许多学者认为此后楚都曾有过变动。但其名称可能未变，仍称郢。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拔郢，楚顷襄王兵散不复战，东北保于陈，是为陈郢。公元前 241 年，在秦军兵锋进逼之下，楚再迁寿春，为楚国最后的都城。至公元前 223 年，秦灭楚，虏楚王负刍，楚国的历史到此终结。

楚国不同时期的都城，只有东迁后的陈郢、寿郢较为明确——陈在今河南淮阳、寿春在今安徽寿县。但陈郢、寿郢和东迁前一段时间的郢都，加起来也

① 《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

② 《史记》卷 40《楚世家》。

③ 楚都迁郢的具体时间有文王、武王二说，传统说法一般据《史记》之《楚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地理志》认为文王始都郢，另一说则据《世本·居篇》和杜预《春秋释例·氏族谱》认为楚武王时已徙郢，自清代以来，宋翔凤、董书业等学者均主武王说，石泉先生通过一系列的比较研究，认为楚武王晚年迁郢当更可凭信。参阅石泉：《楚都何时迁郢》，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52 - 353 页。

只占楚国全部历史的一小段。由于早期楚国弱小，在文献记载中着墨不多，加上先秦时期史料不足，因此楚国早期的都城，便隐藏在一片迷雾之中，千年以来，纷纭不决，至今仍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在东周时期的各大诸侯国中，楚的都城与核心区的争议是最大的。由于楚国大部分时期的都城与核心区不明，给楚国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楚文化研究的发展。

20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在楚文化考古取得较大进展的支撑下，楚文化研究达到了高潮，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全国的区域文化研究中独树一帜。正如楚文化的卓尔不群一样，楚文化研究也是一样的辉煌。但辉煌过后便是困顿，现在楚文化研究似乎正处于低潮期，极端的说法是“几乎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①。部分的原因，楚文化研究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这些成果多半是基于重大考古发现，笼罩在楚文化身上的历史迷雾并未得到真正的清理。当楚文化考古变成一种重复性的资料累积时，这层历史迷雾便成为楚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大阻碍。

楚国都城与中心地域的不明，正是其中最大的迷雾。清理这层迷雾，争取在楚国历史地理的核心问题上有所突破，为楚文化研究的发展扫清道路，是当前楚文化研究的迫切需要。

在楚文化研究的高潮期，学术界对楚国都城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据学者统计，仅1980—1982年的三年中，楚丹阳研究公开发表的论文就达二十余篇^②。楚丹阳和楚郢都诸说在现代均有学者力主，并结合考古与出土文献从各个方面进行论证，将楚都诸说发展成了较为严密的体系。这一时期的讨论虽未能解决楚都的问题，但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可以说，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已为我们探索楚国都城及其中心地域打下了有利的基础，而近二十年来楚文化考古和楚国历史地理研究的进展，则为我们推进这一疑难问题创造了条件。

楚国历史地理研究与楚文化考古是互为表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为楚国历史地理研究提供考古学方面的支持，而综合文献、考古和出土文献等多方面研究成果与手段的楚国历史地理研究，反过来又为楚文化考古提供指导和借鉴。楚国历史地理研究不但要综合考古学方面的成果，而且楚都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必须依赖于考古学方面的证明。但另一方面，考古

① 王光镐：《慎终于始 则无败事》，《江汉考古》1996年第2期。

②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页。

材料多是不会说话的物质遗存，要探讨这些物质遗存所反映的古代社会与历史，就必须借助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才能与之对话。实际上，对物质遗存的解读，是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既有知识体系下进行的。对史前考古来说，要探讨物质遗存所反映的史前社会，需要借助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历史时期考古来说，对物质遗存的认识，完全是在历史体系的框架下进行的，所谓的“证经补史”，即是以考古来补史载之不足，证经史之所疑。因此，如果对历史背景的认识有了偏差，就会导致对考古材料的解读发生较大的偏移。由于史料不足，先秦史的框架体系是相对粗略的，局部发生偏移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情形下，综合文献、考古与其他研究成果，对这种背景性的历史认知体系作一番必要的清理，对于楚文化考古工作会大有裨益，不仅有助于寻找楚文化的中心地域、从考古学上探索楚都，亦有益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与解读，为深化楚文化研究创造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所探讨的大部分时空内，楚都可能是没有城的，因此本书所使用的“都城”一语，是在泛称意义上使用，并不意味着本书认定早期楚都是有城的。“都城”这一概念业已广泛使用，已从专称变成了泛称，成了我们日常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都”与“城”并不能完全截然地分开。此外，先秦时期的“都”是否有“城”，还与国家的形成过程有关，像齐、鲁这类国家因其特殊性，负有武装殖民、军事占领、开拓疆土、统治新区等重要使命，可能建国伊始就有“都城”。当“都城”形成之后，“都”有“城”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都”一般还是最大、最坚固的城，由于这些原因，“都”与“城”在后世的“话语”中已不可分，所以本书仍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使用“都城”这一概念。

都城与核心区的关系，也需要略加说明。都城与核心区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都城不一定在核心区，早期都城也是如此。但一般而言，除非有政治、军事上的特殊需要，都城一般还是位在核心区的。就楚国来说，我们认为其都城与核心区是一致的。

二、研究现状

楚国都城地望作为楚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历史时期以来，先后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和探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也存在诸多歧异和空白。最近三四十年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大批楚文化遗物、遗址公诸于

世,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推动了楚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但由于资料和基础研究的不足、以及研究思路的差异,在楚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仍存在许多争议,一些关键问题未能得到最终解决,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系统探讨。

(一) 丹阳研究

丹阳作为早期楚都,从商末鬻熊始居丹阳,至熊绎受封,仍居丹阳,下至楚武王晚年迁郢为止,作为楚都的时间前后达三百余年^①。

丹阳地望,自东汉班固以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 当涂说。最早出自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班固原注认为楚丹阳在今安徽当涂县^②。此说当为班固之误,后为学者所否定,现少有人提及,可置而不论。

2. 秭归说。最早的依据是东晋时的《山海经》郭璞注^③、袁山松《宜都记》,至郦道元《水经注》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此说在后世影响颇大,唐代著作如《括地志》、《元和郡县志》、《晋书·地理志》、《后汉书》李贤注、《通典·州郡》,宋代著作如乐史《太平寰宇记》、王象之《舆地纪胜》、罗泌《路史·国名纪》,明代著作如董说《七国考》、清代著作如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杨守敬《水经注疏》等,在叙及楚都丹阳时,多作是说,现代学者主“秭归说”者亦较多^④,《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部分,犹定丹阳于秭归^⑤。

3. 枝江说。最早出自东汉颖容《左传释例》:“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

① 此从石泉先生之说,参石泉:《楚都丹阳地望新探》,载《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

② 《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丹扬郡“丹阳”县原注:“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汉丹阳县即今安徽当涂。

③ 按今本《山海经》内常被引作秭归说依据的郭璞注文来历可疑,自相矛盾,学者多疑之,未可信据。

④ 文必贵:《秭归鲢鱼山与楚都丹阳》,《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刘彬徽:《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杨宽:《西周时代的楚国》,《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

⑤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8幅“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第29-30幅“楚吴越”。

是也。”其后，东晋末刘宋初人徐广也说：“在南郡枝江县。”^①汉末三国时人宋衷注《世本·居篇》亦云：“丹阳在南郡枝江县。”^②枝江附近还有地名曰“丹阳聚”^③，为枝江说提供了地名学上的直接支持。汉晋以后，枝江说影响较大。枝江附近有一整套与楚国历史相关的地名系统，如沮漳、荆山、江陵郢都等，因而近世持枝江说者颇众。随着当阳、枝江一带考古工作的进展，尤其是年代较早的赵家湖楚墓和一批有铭铜器、以及当阳季家湖古城与磨盘山遗址的发现，使枝江说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响应^④。当阳季家湖古城，曾被确指为楚丹阳故址^⑤，当阳磨盘山遗址亦曾被认为是丹阳故址所在^⑥。总的来说，枝江说有较早的文献依据，有与楚都相关的一套地名系统，有较多的考古学支持，在地理上邻近秭归和江陵，因此枝江说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近期牛世山、董珊等亦发表文章重申此说^⑦。

4. 丹淅说。认为楚都丹阳在今河南省淅川县境丹江与淅水会流处的丹水之阳。丹淅说最早的依据是《史记》所载公元前312年的秦楚丹阳之战，表明战国时此地犹称丹阳，这是史籍中最早的有确指的丹阳地名，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故楚都，在今均州。”^⑧《通典》卷177《州郡七》南阳郡“内乡”县原注：“本楚之丹邑，有丹水、淅水。”这个楚国的丹邑亦可能与楚故都丹阳有关，此亦丹阳在丹淅之旁证。至清代，经宋翔凤力倡后^⑨，后世信

① 《史记》卷40《楚世家》“居丹阳”句下张守节《正义》和裴骅《集解》引。

② 《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

③ 《后汉书·郡国四》南郡“枝江”县司马彪原注。

④ 黄盛璋、纽仲勋：《楚的起源和疆域发展》，《地理知识》1979年第1期；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高应勤、程耀庭：《谈丹阳》，宗德生：《楚熊绎所居丹阳在枝江说》，均载《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

⑤ 黄盛璋、纽仲勋：《楚的起源和疆域发展》，《地理知识》1979年第1期。

⑥ 高应勤：《再谈丹阳》，载湖北省楚史研究会、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合编《楚史研究专辑》，1982年版。

⑦ 牛世山：《西周时期的楚与荆》，《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董珊：《新蔡楚简所见的“颍项”和“睢漳”》，简帛研究网2003-12-07，<http://www.jianbo.org/admin3/html/dongshan01.htm>。

⑧ 《史记》卷45《韩世家》“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句下司马贞《索隐》。

⑨ 宋翔凤：《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载《过庭录》卷9，中华书局1986年版。